

蘇桂亮 阿竹仙之助 合編

日本孫子書知見錄

孫子と毛沢東

中国的思考の秘密 神子風 水野田河編

齊魯書社

日本孫子書知見錄

蘇桂亮 阿竹仙之助 合編

王健 蘇未 參編

齊魯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日本孫子書知見錄 / 蘇桂亮, (日) 阿竹仙之參編.
— 濟南: 齊魯書社, 2009. 1
ISBN 978-7-5333-2141-3

I. 日… II. ①蘇…②阿… III. 孫子兵法—研究—
圖書目錄—日本 IV. Z88:E892.25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8)第 199956 號

日本孫子書知見錄

蘇桂亮 阿竹仙之助 合編

王 健 蘇 未 參編

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

社 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

郵 編 250001

網 址 www.qlss.com.cn

電子郵箱 qls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東營市新華印刷廠

開 本 650 × 990 / 16

印 張 24

插 頁 2

字 數 321 千
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標準書號 ISBN 978—7—5333—2141—3

定價: 56.00 圓

《孫子兵法》在日本

（代序）

日本是《孫子兵法》向域外傳播最早的國家之一，也是受《孫子兵法》影響最大的國家。孫子兵學思想不僅成為日本軍事思想的重要源頭，千百年來哺育了眾多武士戰將，而且深入到日本人的精神生活，與儒家經典《論語》齊名而受到格外珍視。自《孫子兵法》傳入東瀛，翻譯、註解、研究者代不乏人，其著述刊印從未間斷，迄今已有註釋訓解、義理研討和借鑒應用等著作四百餘種。而其他參引論述《孫子》者更是難以數計。時至近世，日本的《孫子》研究由軍事向社會其他領域擴展，出現了繼江戶時代以來又一個研究《孫子兵法》的高潮，湧現出一批名家大作，成為推動世界性“孫子熱”的一股強勁力量。

《孫子兵法》何時傳入日本，學界至今尚無定論，存在三種說法，即“朝鮮傳入”說、“吉備真備引進”說和“中國兵法家攜來”說。

“朝鮮傳入”說，出自日本著名兵法史學家佐藤堅司所著《孫子思想史的研究》一書。^{[1](P1~3)}他根據《日本書紀》所載，公元 663 年來自朝鮮半島百濟國的幾位兵法家到達

日本，指導修築了幾座城池，並因為精通中國兵法而被授予榮譽勳位。由此，佐藤推測“是他們把中國兵法傳入日本的，而且這部中國兵法可能就是《孫子兵法》”。他的證據是，在五十七年之後成書的《日本書紀》中，記載着“神武天皇之兄征伐磯城的時候，椎根津彥的計策中有‘倏忽之間，出其不意，則破之必也’的語句，這與《孫子·始計篇》的‘出其不意’，以及《虛實篇》的‘趨其所不意’在文字和意思是相同的”。“因此可以認為‘出其不意’是由百濟人傳授的，進而可以認為這些百濟人把《孫子》引進日本。至少可以設想《孫子兵法》最初是由他們傳進來的”^{[1](P1~2)}。

“吉備真備引進”說，則源自《續日本紀》第二十卷天平寶字四年(760年)十一月丙申條的記載：“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關、中衛舍人土師宿彌關城等六人於太宰府，就大貳吉備朝臣真備，令習諸葛亮八陣、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。”據此有些研究者，包括佐藤堅司亦認為“在日本人中最初把《孫子》引進來的是吉備真備”^{[1](P2)}。

“中國兵法家攜來”說，出自美國《孫子》研究家塞繆爾·B·格里菲思。他在英文版《孫子兵法——戰爭藝術》中指出：公元516年，中國一位熟悉兵書的學者曾到日本。公元525年，日本繼體天皇在任命其子粗鹿火為兵馬統帥時曾說過“夫將者，民之命與國之存亡所繫也”。這句話顯然受了《孫子兵法·作戰篇》中“故知兵之將，生民之司命，國家安危之主也”的影響。據此，他說：“我們有許多理由相信，早在吉備真備於公元735年返回祖國之前的幾個世紀，中國古代的軍事經典已被日本人所知。”^[2]

以上三種說法，我們更傾向於第三種說法，並補證

如下：

其一，根據日本史書記載，繼體二十一年（527 年）日本築紫的地方官國造磐井發動兵變（史稱“磐井之亂”），繼體天皇（450～531）在其頒發的討伐叛軍的詔令中，曾寫有這樣的話：“良將之軍也，施恩推惠，危已治人，攻如河決，戰如風發。”“大將，民之司命，社稷存亡，於是乎在。”其思想和用語多與《孫子兵法·作戰篇》“故知兵之將，民之司命，國家安危之主也”暗合。^[3]這再次說明繼體天皇對《孫子兵法》已有所了解。

其二，可以從聖德太子（574～622）頒佈的“憲法十七條”中得到印證。據《日本書紀》：“（推古十二年，公元 604 年）夏四月丙寅朔戊辰，皇太子新肇作憲法十七條。”推古女皇於公元 592 年即位，翌年立聖德太子為攝政。公元 604 年，聖德太子用漢文記述了官吏、貴族必須遵守的十七條政治道德標準，即史稱“憲法十七條”，也有稱“十七條憲法”者。對“憲法十七條”的遣詞用句，日中學者均認為多出典漢籍諸子百家，其中有幾處用語與《孫子兵法》暗合。例如：第十條“是非之理，詐能可定。相共賢愚，如環之無端”；第十一條“明察功過，賞罰必當”；第十五條“上下和諧，其是情矣”。上述依次與《孫子兵法》中《勢篇》“奇正相生，如環之無端”、《計篇》“賞罰孰明，吾以此知勝負矣”、《謀攻篇》“上下同欲者勝”諸句極其相似。儘管有學者研究認為“十七條”中有的句子可能引自《史記》等典籍，但日本學者池田英雄認為“《史記》傳入日本約在大化三年（647 年）”^[4]。因此，不能排除聖德太子研讀《孫子兵法》的可能性。雖然在那時《孫子兵法》作為禁秘書只有皇室少數人能夠接觸，

但聖德太子作為攝政的身份是完全可能看到的。

其三，我國著名日本史學家嚴紹璽先生的研究表明，撰寫於養老四年（720 年）的《日本書紀》，“不僅全用漢字寫作，而且大量引用中國文獻典籍”，“引用了諸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南史》、《北史》、《水經註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述異記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吳子》等書”^[5]。這裏雖然沒有提到《孫子兵法》，但早於《尉繚子》、《吳子》，在戰國時期就“藏孫、吳之書家有之”^[6]的《孫子兵法》，日本來華留學生想必也會千方百計弄到的，只不過當時作為禁秘書流傳不廣而已。

其四，從日本派出遣唐使的時間看，稱吉備真備為《孫子》“攜入日本第一人”的說法也不能令人信服。日本自公元 630 年至 894 年約二百六十年間，共任命過二十次（一說十九次）遣唐使。^[7]吉備真備來華時間第一次是公元 717 年，在中國生活了十八年，第二次是公元 752 年，翌年回國。在吉備真備入唐之前已有八次遣唐使到過中國，時間跨度約一個世紀。而作為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“以學習文化，購求書籍為使命”^{[7]（P202）}。我國《舊唐書·東夷傳》也記載，每次遣唐使歸國，都是“所得錫賚，盡市文籍，泛海而還”。這些都說明歷次遣唐使的一個重要使命是搜求中國典籍。因此，很難想像在吉備真備入唐前的一百多年間，八次遣唐使們會將《孫子兵法》這樣一部重要的兵書漏掉，這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通的。

從上述討論中，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，即《孫子兵法》很可能在 5～6 世紀，最遲不晚於 7 世紀就已經傳入日本列島了，吉備真備並非將《孫子兵法》引進日本的第一人，而是現有文獻記載的首次在日本傳授《孫子兵法》的人。這

樣表述可能更準確、可靠一些。

《孫子兵法》傳入日本後，經不斷發揚光大，逐漸形成獨具日本特色的兵學思想和民族意識。如果將這個過程加以分期的話，大體經歷了早期的秘藏家傳時期、江戶時代的刊刻註釋時期和近世的融合拓展時期。現分述如下：

一、秘藏家傳時期（？～1603）的《孫子》研究

這一時期《孫子兵法》作為禁秘書，只有皇室及親王等權貴能夠接觸到，加之由中土傳來的漢文書籍有限，因此這一時期《孫子兵法》傳播多以手抄口授為特徵。儘管如此，仍有為數可觀的《孫子》書流傳於世，我們可以通過藤原佐世於寬平三年（891年）編撰的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》^[8]，尋覓此間《孫子兵法》的流佈情況。該目在“兵家”條下，共著錄兵書二百四十二卷，其中《孫子》書就有六種：

《孫子兵法》二卷，吳將孫武撰

《孫子兵法書》一卷，巨
詔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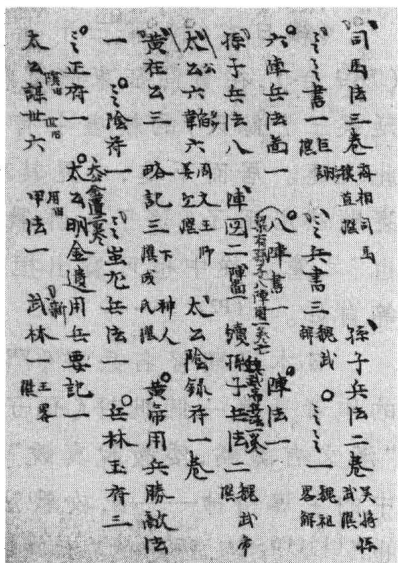
《孫子兵書》三卷，魏
武解

《孫子兵法》一卷，魏祖
略解

《孫子兵法八陣圖》二卷

《續孫子兵法》二卷，魏
武帝撰

這些兵書，均係從中國傳入的典籍。對照《隋書·經籍志》所載，其第二種當為



賈詡《鈔孫子兵法》一卷，第四種即為《孫子略解》，或稱《魏武帝註孫子》，其他均如其名。這個書目，晚於《隋書·經籍志》二百餘年，早於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四十餘年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一百四十餘年。此目著錄的僅是冷泉院火災後的燼餘之書，非全部，可見自日本上古時代以來，《孫子兵法》在日本已有多種版本流傳，收藏相當可觀。而運用《孫子兵法》的情況，通過中日兩國史籍記載的幾件史實，即可見一斑。

《續日本書紀》記載了吉備真備教習諸葛亮八陣、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的史實，還記錄了四年後吉備真備奉命討伐惠美押勝叛亂時，運用《孫子·九地篇》“兵聞拙速”和“兵之情主速”以及“以迂為直”等用兵原則，祇用了八天時間就戰勝了叛軍，將惠美押勝“斬於湖畔”，開日本軍事史上運用《孫子兵法》之先河的事實。^{[1](P2)}

《續日本紀》第三十七卷還記載，桓武天皇延曆八年（789年），在責問征東將軍紀古佐美征討蝦夷遲滯（在衣川延誤三十餘天）的敕書中有這樣的語句：“未審緣何事故致此流連。居而不進，未見其理。夫兵貴拙速，未聞巧遲。”這裏顯然沿用了《孫子·作戰篇》中“兵聞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”之意。從中也可看出桓武天皇對《孫子兵法》運用得何等自如。^{[1](P2)}

日本早期著名兵書《門戰經》（成書於894～1185年）的作者是第一個批評《孫子兵法》的人。該書直率地提出“漢文有詭譎，倭教說真銳”，主張以真銳為主，即日本兵學中的主導精神——正攻戰法；認為“孫子十三篇，不免懼字也”^{[1](P6~7)}，孫子的“五事七計，奇正虛實”，產生於對強敵

的畏懼，不是用兵正道，等等。該書雖然“祇把《孫子》全書曲解為權變和詭道，這是輕率之至”^{[1](P7)}，然而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此時對《孫子》的研究，已深入到字詞的領會和義理的探討，並初步形成了孫子學的“日本特點”^{[1](P6)}。

後冷泉天皇康平五年（1062年），著名武將源義家（1039～1106）在廚川（今岩手縣內）之役中，運用《孫子》“圍師遺闕”之法，大破敵軍。在1084年至1087年“後三年之戰”的陸奥戰役中，一次行軍中發現雁鳥亂飛的現象，源義家受《孫子》“鳥起者，伏也”的啓發，遂判斷敵人有伏兵，果斷修改行軍路線，繞過敵人的埋伏，化險為夷，並奪得了戰爭的勝利，成為《孫子兵法》東傳日本的一段佳話。

據《明史·日本傳》記載，日本弘和元年（1381年）懷良親王在致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封信中，有“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，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”之語。信中所稱“孫吳韜略”，佐藤堅司認為“當然指《孫子》、《吳子》、《六韜》、《三略》”^{[1](P4)}。從這封信中，既顯示了懷良親王對孫吳兵書的精深研究，行文組句信手拈來，又可看出此時中土兵書幾乎盡入日本。

日本戰國時代（1467～1568）是群雄紛爭、名將輩出的時代，出現了諸如楠木正成、武田信玄、上杉謙信、織田信長、豐臣秀吉、德川家康、毛利元就等將領，他們無不把《孫子兵法》奉為圭臬，並用於指揮作戰。例如，著名武將武田信玄（1521～1573），少時即學習兵法，諳熟十三篇，特別鍾愛《軍爭篇》“其疾如風，其徐如林，侵掠如火，不動如山”四句話，並將其濃縮為“風林火山”繡在軍旗上，作為自己追求的用兵境界。另一位是被稱作“《孫子》真正實踐者”的豐

臣秀吉(1537~1598),在美濃攻略時期,他避免使用強攻,而是通過謀略努力使對方或歸順或投降。爲此,他特別重視情報,不惜使用金錢和糧食,直至對對手情況瞭若指掌後纔投入戰鬥,即“勝而後戰”是他的拿手戰法。號稱“戰國武將中鶴立雞群”的織田信長(1534~1582),善用孫子“奇正”等謀略思想,在長條戰役中他集中三倍於武田方的兵力作爲正兵,又組織三千支火槍隊作爲奇兵,擊退冒進突入的武田勢力。其運用《孫子》之妙,使他成爲著名的兵法家,被視爲在日本武將中“沒有可與信長齊名的名將”。

此時期限於秘藏和漢文書籍稀少,《孫子兵法》多以手抄口授爲特徵,經過長期的父子師承傳授,形成了專事傳抄、訓點和授讀的“明經世家”,其中以清原家久擅盛名。清原宣賢(1475~1550)自號環翠軒,他於天文五年(1536年)所撰《孫子抄》,是目前所知日本現存最早的訓讀本,與其家傳本稱爲“清家正本”,被日本政府列爲“重要文化財”予以特別的保護。^[9]

縱觀這一時期的《孫子》研究,雖因禁秘書而局限在皇室上層的小範圍內,但並沒有阻礙其傳播和在軍事鬥爭中的運用,並爲後來江戶時代《孫子》研究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基礎。

二、刊印註釋時期(1604~1868)的《孫子》研究

這一時期,即指江戶時代。此間研究《孫子》者近百家,刊印《孫子》書達一百四十餘種,日本的《孫子》研究從此進入鼎盛時期。具體表現在:

一是活字印刷《武經七書》,開創刊刻兵書先河。在閑室元佶(1548~1612)主持下,於慶長四年(1599)復刊了

《六韜》和《三略》，四年後印畢，又於慶長十一年（1606年）刊印《七書》（即宋代施子美《武經七書講義》的白文本），從此結束了日本手抄摹寫漢籍兵書的歷史。

二是首啓註釋《孫子》之風。以江戶大儒林羅山（1583～1657）爲代表，他先後校點註釋《七書評判》、《孫子抄》和《孫吳摘語》，尤以《孫子諺解》最爲著名，被認爲“江戶時代的《孫子》研究，是從林羅山的《孫子諺解》開始的”。雖然林氏的註解“僅限於簡單的字句註釋，並不是主動的研究”^{[1]（P15）}——也就是說，尚不是真正的註釋，但因其顯赫的地位和影響，對江戶時期《孫子》研究的勃興起到了推動的作用。

三是《孫子》註釋大家輩出。繼林羅山之後，註解《孫子》遂成一代風氣，群起而效法，出現了諸如北條氏長、山鹿素行、荻生徂徠、新井白石、德田邕興、吉田松陰、恩田仰岳等一批至今仍有影響的《孫子》註家。例如，北條氏長（1609～1670）“在日本的《孫子》研究者中間，佔據着特殊的地位，因爲他不僅研究了世間常見的《孫子》，即《今文孫子》，而且他還是鮮爲人知的《古文孫子》的研究者”^{[1]（P22）}。此外，北條氏長在其名著《士鑒用法》書中，將《孫子》的“五事”、“七計”、“詭道”，活用爲“治內”、“知外”、“應變”之說，並認爲“‘兵者，國之大事也’此語十三篇之大綱”。故而佐藤堅司稱讚道：“氏長對於《孫子》的解釋，從一開始就大放異彩”^{[1]（P23）}。他還認爲北條氏長對孫子用間的研究，“纔是孫子‘用間’的理解者，纔是對《孫子》首尾兩篇的知音”^{[1]（P27）}。有學者研究認爲，他還是將《孫子兵法》引入經濟領域的“日本兵法經營的鼻祖”^[10]。山

鹿素行(1622 ~ 1685) 爲山鹿派兵學創始人, 青年時代分別寫出《孫子諺解》和《孫子句讀》, 晚年又撰寫了《武經七書諺義》, 另有《孫子要證》、《孫子講義備攷》等, 傾畢生精力研究《孫子兵法》。特別是他對十三篇自成體系的精闢論述, 被認爲是對《孫子》研究的“卓越的貢獻”, 並獲得了“日本的孫子”的美譽。^{[1](P32)} 荻生徂徠(1666 ~ 1728) 爲徂徠學派創始人, 其所著《孫子國字解》, 對《孫子》作了詳盡的解釋, 並引用戰例和日本的劍術作比喻, 別開生面。此外, 他還將研究延伸到其名著《鈴錄》中, 使孫子思想成爲該書的靈魂。徂徠另著有《孫子九地問對》, 流佈甚廣, 中土多傳其書。新井白石(1657 ~ 1725), 江戶時期著名朱子學家、歷史學家, 一生著述甚豐, 著作多達一百六十餘種。其所著《孫武兵法擇》和《孫武兵法擇副言》, “和(山鹿)素行一樣對《孫子》全篇進行了綜合研究”, 其註釋的最大特點是用《孫子》語句自註, 並把《孫子》與《管子》聯繫在一起。他還將十三篇作爲科學體系進行綜合研究。由於他對《孫子》研究的獨特貢獻, 佐藤堅司稱此書“不僅是日本研究《孫子》的經典之作, 而且堪稱在日本史學史上達到了頂峰”, “在江戶時代的《孫子》研究史上佔據了極高的地位”^{[1](P73)}。德田邕興(1738 ~ 1804), 爲合傳派武學始創人, 江戶時代研究《孫子》的六大權威人物之一。其所著《孫子事活鈔》, 重視《始計篇》和《用間篇》的首尾一貫關係, 並將《孫子》與現實相結合, 故題爲“事活”, 而註釋皆聯繫日本的現實, 體現了合傳派兵法注重實際, “將《孫子》和本邦(指日本)的神武合爲一體”的學派宗旨。^{[1](P103)} 吉田松陰(1830 ~ 1859), 少時即學習兵學、炮術和西洋陣法, 因反對幕府鎖國政策而入

獄，出獄後自辦松下村塾，培養了伊藤博文等明治維新一批骨幹。他對其所著《孫子評註》頗為自信，謂“余深得孫子之妙”^{[1](P138)}。其註釋言簡意賅，深得《孫子》奧旨，刊印後頗受重視，乃木希典曾予重印，分贈友人。思田仰岳（1809～1891），為長沼派武學者，著名漢學家。其所著《孫子纂註》，沒有沿襲舊說，而以自己的見解和形勢的需要作論，故佐藤堅司感歎他“隨時把自己的語言同《孫子》糅合在一起，這種活用孫子語言的本領實在令人驚歎”，稱讚此書“是一部可以同素行的《孫子諺義》一爭高低的名著”^{[1](P146)}。

以上所列，僅是江戶時代註釋《孫子》的一個縮影，從中我們看到此間研究《孫子》之風何其興盛。

四是孫子思想成為武學流派的兵學源頭。佔據江戶時代武學統治地位的甲州派、越後派、北條派、山鹿派和長沼派，它們的創始人既是信奉儒家學說的大儒學者，又是研究《孫子兵法》的權威人物，孫子思想對各派產生深刻影響，成為各派兵學思想的源頭。例如，北條派武學，把《孫子》“五事”、“七計”、“詭道”作為兵法的綱要，形成北條派兵學的“治內、知外、應變”之說；把懂得間諜秘密的人視為真正懂得北條氏長“方圓神心”的人。故佐藤堅司說：“他以孫子的兵法配之，創出通達事理的一個流派。”^{[1](P24)}而山鹿派的創始人山鹿素行，他對各派兼收並蓄，而對其影響最大的是《孫子兵法》。他不僅對《孫子兵法》進行了系統攷察，而且應用於武學，把《孫子》“五事”、“七計”、“詭道”作為用兵“三要素”予以吸收。他在其所著《武教全書》中稱：“縱然兵法之運用千變萬化，但萬變不離其宗，掌握其三要素，善於靈活運用者，方合乎兵法之大理也。”^{[1](P37)}另一個是

長沼派武學，該派一反其他流派多崇尚孫吳韜略，而標榜孫（武）、吳（起）、俞（大猷）、戚（繼光）。《孫子兵法》對該派的影響可以從其《兵要錄》中得到印證。該書的六篇中，每篇都有《孫子》的引文，尤其重視孫子關於戰爭與經濟關係的論述，強調持久戰帶來的惡果，“依之民怨，而望國之傾覆，民怨於內，敵伺於外，國之亡，豈有日哉”^{[1](P55)}。足見長沼派對《孫子兵法》理解之深和影響之大。

五是影響了一批兵學著作。《孫子兵法》不僅催生了新的武學流派，出現了流派林立的局面，而且也左右了兵家武士的兵學思想，產生了一批重要的兵書典章。例如，集甲州派兵學思想大成的《甲陽軍鑒》，在該書中，小幡景憲（1571～1663）吸收《孫子·計篇》的思想，於“軍法之卷”中首次提出甲州派的“三要素”，即武略、智略、計策。佐藤堅司將其與《孫子兵法》相對照，認為“其一武略相當於孫子的‘知己’（五事），其二智略相當於孫子的‘知彼’（七計），其三計策相當於孫子的‘應變’（詭道）”^{[1](P19)}。從中我們不難看出，《甲陽軍鑒》已將《孫子兵法》的精華盡收書中。《兵法綱紀十四章》是香西成資闡釋甲州派兵法的重要著作，在該書中“隨處可見援引《孫子》、《六韜》、《三略》、《易》等書中的字句，其中以引自《孫子》的為最多”^{[1](P47)}。書中總結的六條知勝之道基本都源於《孫子兵法》，而對孫子奇正之術的辨析，更是深得其要旨。特別是他批評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是無謀之舉，觸犯了孫子“以寡擊眾”、“久暴師於外邦”的大忌。這裏香西成資不僅把《孫子兵法》融入自己的著作中，而且活用於軍事鬥爭實際。另一部是《士鑒用法直旨鈔》，其著者松宮觀山素有日本武學泰斗之稱，其書稟承

北條派“治內”(五事)、“知外”(七計)、“應變”(詭道)之旨,並有所發展,對應變的內涵增補了孫子“廟算”的內容。他說:“治內以知己,知外以知彼。廟算定,則可勝之理明矣。”^{[1](P97)}可見,松宮觀山已注意到孫子廟算在軍事決策中的重要性。而《省譽錄》的作者佐久間象山,雖“沉溺於有效果的西洋最新兵術而忽視了《孫子》裏的奧妙兵理”,但還是認為“漢土兵家之書,莫高於《孫子》”,承認“漢與我,有《孫子》以來,莫不誦詠講習……今真欲修飭武備,非先興此學不可”^{[1](P124~126)}。他對孫子的用間思想,既是贊同者,也是實踐者,他說:“用間在得人,全勝在知彼。”^{[1](P129)}為達到知彼,他選出門人中的上智者,準備作為間諜派往國外去調查外國的情況,其中就有其高徒吉田松陰。這裏,《孫子兵法》已非用影響所能涵蓋,而成為佐久間象山行動的指南。

三、融合拓展時期(1868~現今)的《孫子》研究

此時期可分為二次大戰戰前和戰後兩個階段。日本明治維新,結束了日本長達幾百年的幕府統治,迅速邁向資本主義的現代化。這時期的特點是“和魂洋才”,東西匯合,以《孫子兵法》為基礎的日本傳統兵學與西方新興的近代軍事思想相融合,使日本兵學重新整合,孫子兵學理論在近代先進軍事條件下,繼續發揮着作用。明治時代儘管軍界把目光主要投向西方,但對《孫子兵法》的研究和運用仍佔重要的地位,尤其對海軍的影響更是根深蒂固。此間叱咤風雲的軍事將領多數兼修東西兩種軍事學說,並在戰爭中付諸實踐。如日本聯合艦隊司令東鄉平八郎,在日俄戰爭中運用《孫子》“以佚待勞,以飽待饑”的思想,將艦隊部署在俄

艦隊必經的航線上，以自己的安逸之軍，迎擊俄艦勞饑之敵，全殲俄第二太平洋艦隊，創造了日本海軍史上著名的戰例。據稱，東鄉視《孫子兵法》為護身符，每次艦隊出航都隨身攜帶。他曾手書《孫子》“以正合，以奇勝”題贈友人，足見其對《孫子兵法》是何等鍾情。^[11]

《孫子兵法》對日本海軍初創影響甚大。1903年，海軍大學八代六郎上校（後為上將，海軍大臣）編譯的《戰爭藝術精髓》中，將《孫子》、《吳子》等兵書與約米尼的《戰爭藝術回憶概要》和哈特的《戰爭藝術回憶錄》進行對比，論證二書對海軍作戰的指導價值。海軍中將佐藤鐵太郎是確立明治海軍新戰略的關鍵人物，也是《孫子兵法》的信奉者。他稱讚“《孫子兵法》是從古到今研究實用戰略最全面最深刻的書。如果你想研究最深刻、最實用的兵法，就一定要研究《孫子》和《三略》”。他不僅撰寫了《意譯孫子》，還為裕仁天皇講解《孫子兵法》，為此特地撰寫了《孫子御進講錄》。當代日本學者認為，明治時期海軍之所以能取得對馬海戰勝利，就在於“他們從未應用卡爾·馮·克勞塞維茨的理論”，而是“根據《孫子兵法》哲理指導日俄戰爭的”^[12]。日俄戰爭後，有日本“軍神”之稱的乃木希典，還自費出版了山鹿素行的《孫子諺義》，並手書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”，分贈友人，以紀念日本取得的勝利。^[13]

也有學者研究認為，日本在日俄戰爭中能以小勝大，得益於日本的情報活動。戰爭爆發前，日本在中國和朝鮮半島建立了龐大的情報網，對俄國在遠東的整個陸海軍實力、兵力部署及軍事動員能力等瞭如指掌。通過無孔不入的情報網，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俄國對遠東戰爭沒有做好準備，